

近代学术转型中的子史关系

——以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为中心

宁腾飞

【提要】 “诸子亦史”说是清末时期国粹派提出的重要创见,是中国传统学术转型的表现形态之一。该说的提出,一方面,基于清代学者章学诚、龚自珍等关于诸子与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缘于在晚清经今古文之争的情境中,反思康有为对孔子及诸子的宗教化阐释。章太炎、邓实、刘师培虽对子史关系的论证方式存在差别,但皆主张“诸子亦史”。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此后,老辈学人张尔田、孙德谦、江璩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反映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转型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学的史学化之内生转型路径。

【关键词】 “诸子亦史”说 国粹派 子史关系 学术转型

在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中,史学成为学术焦点之一。其中,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及其近代回响,充分体现了“经降史升”的趋向。譬如,罗志田从学术演变的内外理路讨论了经史的易位过程,指出经学从学术中心到边缘,而史学从边缘到中心。^① 其实,除了经史关系的嬗变外,子史关系也应引起必要的关注。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言,“史同子的关系,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② 在近代学术转型中,“诸子亦史”说可谓子史关系讨论的一个典型代表。就“诸子亦史”的观念而言,学术界虽有所涉及,然鲜有专门讨论。^③ 基于子史关系的理论意义,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以国粹派学人的“诸子亦史”说为中心,讨论子史关系及其近代演进,以揭示学术转型中被轻视的一个关键性面向。

一、国粹派“诸子亦史”说的理路与语境

1917年,江璩在《读子卮言》中写道:“近儒谓‘《六经》皆史’,其实诸子、诗赋、兵书亦皆史也。”^④ 实际上,江璩所言并非空谷足音,而是反映了清末民初学术界关于子史关系的新探索。在具体分析“诸子亦史”说之前,有必要考察国粹派学人提出该说的背景。其中,既有学术演化的内在理路,也有

①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341页。

② 白寿彝:《在全国第一次史学史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408页。

③ 李孝迁:《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探析》,《社会科学辑刊》2001年第5期。

④ 江璩:《读子卮言》,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4页。

思想论争的外在语境。就学术理路言,清代学者对子史关系产生了新的认识,尤以章学诚和龚自珍为代表。就思想语境言,在晚清的今古文之争中,康有为主张孔子和诸子的宗教化,而国粹派则针锋相对地主张孔子和诸子的史学化。这些背景是充分理解国粹派“诸子亦史”说的前提和关键。

古代尤其是清代学者就注意审视诸子与史的学术联系。汉代时,班固就试图建立道家与史官的联系,称“道家者流,盖出于史官,历记成败、存亡、祸福、古今之道”。^①唐代编撰的《隋书·经籍志》载“古者,司史历记前言往行,祸福存亡之道。然则杂者,盖出史官之职也。”^②在清之前,学者对子史关系的讨论较为零散。在前人基础上,清代学者对子史关系的认识有了深层次的探析。清初,马骥出版《绎史》。从史料来源来看,马骥广泛地采取诸子书籍的相关论述,“在史料上把经、史、诸子平等看待”。^③这其实是一种“以子证史”的方法。有学者以为这种以子证史的方法“蕴涵着一种新的史学观念,即诸子亦史”。^④实际上并非如此。因为以子证史是一种史学方法,而诸子亦史是一种史学观念,二者并不相等。值得特别注意的是,李清为《绎史》所作的序言明确提到了“子亦史”的观念。他说:“或曰:以经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唐、虞作史而综为经,两汉袭经而别为史,盖经即史也。或曰:以子为史可欤?曰:奚不可!夫诸志,史也,而错以为经;小学,经也,而错以为子。故子亦史也。”在这段话中,李清不仅主张“经即史”,而且认为“子亦史”。关于前者,学人多有讨论,如南宋的陈傅良,明代的宋濂、王阳明、李贽,清代的章学诚、袁枚、龚自珍等;^⑤而后者则鲜有讨论。李清还指出,“以史为史易,以经为史难。以经为史易,以子为史难。”^⑥所以,相较于“经即史”,“子亦史”的提出更是难能可贵的,具有非常的意义。

继李清之后,对于子史关系有所讨论的学者是章学诚。章学诚不仅讨论历史观念,还对诸子学有较多研讨。如侯外庐所言,“他可以说是18世纪研究诸子的最有成绩者”。^⑦在此基础上,章学诚对于子史关系也有深刻的讨论。

第一,主张“子出于史”。章学诚在《易教上》提出“六经皆史”的命题。他指出:“六经皆史也。古人不著书;古人未尝离事而言理,《六经》皆先王之政典也。”^⑧这导源于章学诚与甄秀才讨论文史关系,^⑨其后延伸至经史关系和子史关系等。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晚清以来多得学人垂爱。可是,此说仅是先秦学术系谱的一部分。章学诚在《诗教上》中还重申了“诸子出于六艺”的论断。他说:“战国之文,其源皆出于六艺,何谓也?曰:道体无所不该,六艺足以尽之。诸子之为书,其持之有故而言之成理者,必有得于道体之一端,而后乃能恣肆其说,以成一家之言也。”^⑩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章学诚不仅承认“诸子出于六艺”,还承认诸子“得道体之一端”。在一定程度上,章学诚通过重申诸子与六艺的关系,凸显了诸子学的独特价值。因为这与诸子的“异端”形象判然有别。如果“六

① 班固《汉书·艺文志》,商务印书馆1955年版,第28页。

② 魏徵等《隋书》卷34《经籍三》,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1010页。

③ 陈其泰《略论马骥的史学成就》,《史学月刊》1985年第2期,第45页。

④ 刘仲华《清代诸子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36页。

⑤ 周予同《周予同论经史关系之演变——纪念周先生诞辰百周年》,《复旦学报》1998年第1期。关于经史关系的全面考察,参见汪高鑫《中国经史关系史》,黄山书社2017年版。

⑥ 李清《绎史·序》,马骥《绎史》,王利器整理,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2页。

⑦ 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5编,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60页。

⑧ 章学诚《易教上》,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浙江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第1页。

⑨ 章学诚《校讎通义通解》,王重民通解,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年版,第178页。

⑩ 章学诚《诗教上》,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5页。

经皆史”和“诸子出于六艺”成立,那么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得出“诸子亦史”的认识。正如邓实所言,“知六艺之为史,而又知六艺为九流之所共,则九流固同出于史也。”^①

然而,章学诚并没有明确地提出“诸子亦史”的命题。仅在论述中,发现一条“子出于史”的提法。章学诚在《报孙渊如书》中说:“以为盈天地间,凡涉著作之林,皆是史学,六经特圣人取此六种之史以垂训者耳。子集诸家,其源皆出于史。”^②从中可见,章学诚在“尊史”意识下对于子史关系的论述。

第二,主张诸子与史互通。“子出于史”是从学术源流的角度论述的,而“子史互通”则是从学术内容的角度论述的。在《论修史籍考要略》中,章学诚专门设定“子部宜择”的准则,称“诸子之书,多与史部相为表里,如《周官》典法,多见于《管子》、《吕览》,列国琐事,多见于《晏子》、《韩非》”。^③十年后,章学诚在《史考释例》中对此再次阐发,对于子史关系的认识更为深刻。他认为,“自夫子有知我罪我之言,明《春秋》之所作,而战国诸子,遂以《春秋》为著书独断之总名,不必尽拘于编年纪月,而命名亦曰《春秋》,此载籍之一大变也。然年月纵可不拘,而独断必凭事实,于是亦自摭其所见所闻所传闻者笔之于书,若史迁所叙,铎椒、虞卿、吕不韦之所撰述,虽曰诸子家言,实亦史之流别……法家之有律令,兵家之有武备,说家之有闻见,谱录之有名数,是子库之通于史者什之九也”。^④其中,章学诚得出“子库之通于史者十之九也”的认识可谓深刻。民国时期,顾颉刚对此仍然赞叹不已,称赞说:“自从章氏出来,说‘六经皆史’、‘诸子与六经相表里’,‘文集为诸子之衰’,拿隔人眼目的藩篱都打破了,教学者从他们的学术思想的异同上求分类,不要在书籍形式上去求分类,这在当时实在是可惊的见解。这不能不看做清代史学特别发达的结果。”同时,他也表示惋惜,因为“那时学者为琐碎的考证束缚住了,不能懂得他的意思,所以那书虽是刻了,竟无声无臭了近一百年”。^⑤

如果说章学诚的“诸子亦史”观念仅在字里行间透露,那么龚自珍对于“诸子亦史”的认识则显而易见。在《古史钩沉论二》中,龚自珍宏观地论述了他的学术观念,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是明确的“尊史”意识。在他看来,周代最大的世官就是史官。不仅如此,他还把史与家国存亡联系在一起,认为“史存而周存,史亡而周亡”。其二,五经为周史的大宗。《易》为卜筮之史;《书》为记言之史;《春秋》为记动之史;《风》是史采于民;《雅》《颂》是史采于士大夫;《礼》是史职所掌管的律令。其三,诸子为周史的小宗。他认为,“夫道家者流,言称辛甲、老聃;墨家者流,言称尹佚;辛甲、尹佚官皆史,聃实为柱下史。若道家,若农家,若杂家,若阴阳家,若兵,若术数,若方技,其言皆称神农、黄帝。神农、黄帝之书,又周史所职藏,所谓三皇、五帝之书者是也”。^⑥龚自珍对子史关系的认识已经远远超越了“道家出于史官”的命题,因此,他批评汉代刘向以为仅道家出于史官而不知其余各家也出于史。如此,龚自珍在诸子与史之间建立了普遍性的联系。

从上述可见,“诸子为周史之小宗”的观点是龚自珍构建先秦学术体系的一部分。一方面,他固然建立了诸子与史的学术联系;另一方面,他也把经和诸子并列,提高了诸子学的地位。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虽则大宗、小宗之称名有异,然皆为‘周史则一’,是可见自珍在周史的存续上,是将诸子

①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② 章学诚《报孙渊如书》,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721页。

③ 章学诚《论修史籍考要略》,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34页。

④ 章学诚《史考释例》,仓修良编《文史通义新编新注》,第439—440页。

⑤ 顾颉刚《致胡适》(1920年10月28日),《顾颉刚全集》第39卷,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284页。

⑥ 龚自珍《古史钩沉论二》,《龚自珍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21页。

的地位予以提高。自珍此一诸子学的重估,有其重要的学术史意义”。^① 龚自珍的这些认识被国粹派学人所汲取,成为“诸子亦史”说的重要知识资源。

清代学人尤其是章学诚和龚自珍对于子史关系的考察,为近代国粹派学人建构“诸子亦史”说提供了思路,也奠定了学术基础。章太炎在《清儒》中就称赞章学诚说:“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过《史通》。”^②在邓实的《国学微论》中,章学诚和龚自珍的言论也到处可见。他引用汪中、龚自珍和章学诚的言论,评论道:“三子者,近世所号三通儒也。其学皆能成一家言者,而言若是,是亦可观矣。盖古者一代之兴,必有一代之仪法、文字、典籍,而史官实司其典守。”^③另外,刘师培的《古学出于官守论》直接引用龚自珍的观点,即诸子学术为周史的支孽小宗。且刘氏认为,“龚氏所言虽未尽当,然推诸子学术,以为皆出于史官,固不易之确论也”。^④ 这些论著充分地表明了清代学人对于国粹派的影响。

学术理路之外,国粹派“诸子亦史”说也有其特殊的思想语境,即晚清的经今古文之争及其对于诸子学认识的差异。对于晚清的经今古文之争,学术界多有讨论。有学者指出,章太炎与康有为所展开的今古文之争,并非革命和改良的分别,而是经学的史学化与儒学的宗教化、民族主义与孔教主义的差异。^⑤ 这的确抓住了经今古文之争的关键问题。然而,以往学界多关注今古文家对孔子认识的差异。如章太炎的《今古文辨义》《订孔》、刘师培的《孔学真论》《论孔子无改制之事》等。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史学化与宗教化的差异不仅仅表现在经学与儒学的认识上,也同样体现在对诸子学的理解上。也就是说,清末诸子学研究存在史学化与宗教化的根本性分歧。

关于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学界多强调其政治思想史意义,而轻视其学术史意义。如果把视角从政治思想史转移到学术史,那么《孔子改制考》的意义绝不仅限于“孔子托古改制”。从学术史来看,《孔子改制考》是一部系统的诸子学著作,对近代诸子学有深远的影响。在《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中,侯外庐明确地揭示了《孔子改制考》与近代学人的关联,认为它在中国学说史、中国古史方面对梁启超、胡适、钱玄同、顾颉刚都有重要的影响。并且,侯外庐指出,“《孔子改制考》一书,在背面上的价值,成为最早的有系统的先秦诸子思想研究”。^⑥ 侯外庐的这一认识对于我们理解康有为和诸子学之间的联系具有重要的启示。如此,在孔子“托古改制”之外,也应当注意到《孔子改制考》对于诸子论述的宗教化路径及其对于近代诸子学的影响。在《孔子改制考》中,康有为不仅论证了“儒教为孔子所创”,还分析了“诸子并起创教”;不仅研究了“孔子创教改制”,也探究了“诸子创教改制”;不仅考察了“孔子改制托古”,也证明了“诸子创教改制”。

并且,从《孔子改制考》的架构来看,诸子创教改制托古是孔子创教改制托古的前提。其论证逻辑为三段论:诸子创教改制托古;孔子为诸子之一;孔子创教改制托古。关于孔子与诸子的关系,康有为多次引用《论衡》,说明“孔子为诸子之卓”、“孔子,诸子之杰者也”。^⑦ 这看似常识的论断,其实蕴含着一个重要的学术信息:康有为把孔子视为诸子之一,而非超越诸子之外的存在。康有为明确

① 张寿安《龚自珍学术思想研究》,台湾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68页。

② 章太炎《菴书》(重订本)朱维铮校点,《章太炎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55—156页。

③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④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53页。

⑤ 刘巍《中国学术之近代命运》,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51页。

⑥ 侯外庐《近代中国思想学说史》,三联书店2014年版,第1091页。

⑦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11、241页。

地说“孔子为创教诸子之一人”^①。与同时期的廖平言论比较,康有为论断的意义就明显地体现出来。廖平在《知圣篇》中说:“或以诸子皆欲传教,人思改制,以法孔子,此大误也。今考子书,皆春秋后四科流派,托之古人。”^②廖平尊孔的意图尤为凸显,如此,孔子与诸子之间则形成了高低贵贱之分。

与康有为的诸子宗教化路径不同,国粹派学人主张诸子的史学化。关于孔子,康有为称“孔子为万世教主”^③;章太炎则称“孔氏,古良史也”^④。关于诸子,康有为称“周末诸子并起创教”^⑤。刘师培则针锋相对地提出“战国诸子之非创教”,批评道:“乃近人则谓战国诸子均各自创教,各自改制。”“近人”即是康有为。究其缘由,大致有四。一是“诸子之说均有所本”;二是“诸子之学均援古书”;三是“诸子之学虽地而异”,“此皆学术之殊科,非关宗教之同异”;四是“学术固与宗教不同”。^⑥在破的同时,刘师培更注重立,提出“九流出于史”^⑦,下文将详细讨论。这种经今古文之间的争论与对立正是理解国粹派“诸子亦史”说的关键所在。因此,国粹派的“诸子亦史”说虽然受到了龚自珍的影响和启发,但是在学说的内涵与旨趣上绝非相同。龚自珍把经学和诸子学纳入史学的范畴之中,这与“尊史”意识固不可分。但是,“尊史”的背后是“循问学之阶,以上达于性道治天下”的“经世”思想。这才是龚自珍学术思想的总纲。^⑧因此,龚自珍的“诸子周史之小宗”论的旨趣显然在于“经世”。而国粹派的“诸子亦史”说主要是针对康有为的诸子宗教化而言的。可见,国粹派的“诸子亦史”说表面上与之类似,并存在着思想的延续性。然而,学说的旨趣却是泾渭分明的,不可等而视之。

综上所述,国粹派提出“诸子亦史”说的背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清代学者开始突破四部之学的局限,思考子史关系,提出了“子出于史”、“子史互通”、“诸子为周史之小宗”等观点。国粹派吸收了他们对子史关系的思考。另一方面,晚清经今古文之争不仅体现在孔子和儒学方面,也体现在诸子和诸子学层面。康有为把孔子和诸子宗教化,而国粹派学人并不以为然,主张把诸子史学化。

二、国粹派“诸子亦史”说及其内涵

在学术理路和思想语境下,国粹派学人章太炎、邓实、刘师培等皆主张“诸子亦史”说。实际上,诸子学与史学在国粹派的学术体系中占据重要的地位。就诸子学言,国粹派学人所复兴的古学,主要是诸子学。正如邓实所言,“古学虽微,实吾国粹。孔子之学,其为吾旧社会所信仰者,固当发挥而光大之;诸子之学,湮没既千余年,其有新理实用者,亦当勤求而搜讨之”。^⑨就史学言,国粹派学人以历史来造就民族主义的爱国心,以历史作为促进未来文明的利器。章太炎、马叙伦、邓实、黄节等皆有充分论述。^⑩而“诸子亦史”说的形成,将诸子与历史的因素绾合在一起,更加强化和凸显了诸子学与史学的学术价值。虽然“诸子亦史”说是国粹派学人的共识,但是在具体的论证层面,他们并

①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377页。

② 廖平《知圣篇》,蒙默编《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廖平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98页。

③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145页。

④ 章太炎《馥书》(重订本),《章太炎全集》,第133页。

⑤ 康有为《孔子改制考》,第10页。

⑥ 刘师培《论孔子无改制之事》,《刘师培儒学论集》,第261—262页。

⑦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52页。

⑧ 张寿安《龚自珍的学术思想》,第150—154页。

⑨ 邓实《古学复兴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9期。

⑩ 郑师渠《晚清国粹派文化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140—141页。

不一致。

其一,章太炎与“诸子亦史”说。章太炎是近代“诸子出王官”论的坚决拥护者。虽然从历史记载层面无法全部证实,但是他依然承认“其他虽无征验,而大抵出于王官”。关于诸子来源,章太炎加以坐实的只有四家,道家 and 儒家为古史家,墨家和阴阳家为古宗教家。这在《诸子学略说》中有明显的体现。根据“诸子出于王官”,他坚持“道家出于史官”,另据《史记》的记载,认为老子为柱下史。关于老子与史的联系,学界历来争议不大。

章太炎对于孔子与史的论证独具特色。早在《馗书》(重订本)中,章太炎就有“订孔”的言论,核心在于孔子为古良史。^①其理由是“辅以丘明而次《春秋》料比百家,若旋机玉斗矣”。^②孔子之所以为良史,主要因由在于删定六艺。此外,章太炎还极力凸显孔子受学于老子,进而强调孔子与史的关系。从孔子方面看,“孔子问礼老聃,卒以删定六艺,而儒家亦自此萌芽”。在文中,老子为“儒家之先导”、“孔子受学老聃”、“孔学本出于老”随处可见。从老子方面言,“老子以其权术授之孔子,而征藏故书,亦悉为孔子诈取。孔子之权术,乃有过于老子者”。^③因此,从孔子删定六艺、孔子受学于六艺两方面,章太炎证明了孔子亦史。

在《诸子学略说》中,章太炎仅说明了老子、孔子与历史相关,其余诸子则无说明。然而,在晚年时期,章太炎对于子史关系的认识显然出现了范围扩大的趋向,开始突破老子和孔子而涉及其他诸子。1933年3月15日,章太炎在无锡国专演讲《历史之重要》。其中,他就重申了“子史互通”。在他看来,“史与经本相通,子与史亦相通。诸子最先为道家,老子本史官也,故《艺文志》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史官博览群籍,而熟知成败利钝,以为君人南面之术。他如法家,韩非之书称引当时史事甚多。纵横家论政治,自不能不关涉历史。名家与法家相近。惟农家之初,但知种植而已。要之九流之言,注重实行,在在与历史有关’”。^④文中,章太炎在儒家和道家之外,又说明了法家、纵横家、名家等与史的联系,并且得出“子史互通”的认识。

其二,邓实与“诸子亦史”说。1902年,邓实在《史学通论》中就阐发了史的地位和作用,称“古者,天子诸侯必有国史,皆世其官。官存而史存,史存而国存;官亡而史亡,史亡而国亡。左史记言,史之外无有言焉。右史记事,史之外无有事焉。是故六经者,史之大宗,经亦史也;诸子者,史之小宗,子亦史也”。^⑤虽然邓实的核心论述在于神史、君史、民史,但是在史学的总论层面,邓实明显地汲取了龚自珍《古史钩沉论》。在论述的逻辑展开、论述的学术主张上,二者一脉相承。其中,最重要的在于,邓实延续了龚自珍的“经亦史”和“子亦史”的观念。

如果说《史学通论》显现了邓实继承龚自珍“子亦史”的观念,那么,1905年发表的《国学微论》则是邓实对“子亦史”观念的深化和扩展。邓实从老、孔、墨三宗和诸子百家学两方面加以论证。首先,老、孔、墨三家导源于史官。老子为周守藏史,《史记》与《汉书·艺文志》皆有记载。孔子之学导源于史者也较多。因为“孔子之学,周公之学也。六艺皆周公之旧典,守于史官,孔子删订六经,皆得

① 关于《订孔》篇的成立,王汎森曾有专门的讨论,指出其最初动机并非受日本的影响,主要原因在于(1)与康有为的孔教论辩难;(2)受清代诸子学复兴的影响,相信诸子书籍所记的孔子事迹。详见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7—178页。

② 章太炎《馗书》(重刻本),《章太炎全集》,第133页。

③ 章太炎《诸子学略说》,汤志钧编《章太炎政论选集》(上册),中华书局1977年版,第292页。

④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章念驰编订,《章太炎演讲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51—352页。

⑤ 邓实《史学通论》,《政艺通报》1902年第12期。

之于史,故因鲁史而作《春秋》”。^① 墨子为史角的弟子,而且“清庙之守”非巫即史,所以墨子也出于史官。综上,邓实得出结论:“老、孔、墨三家皆起于春秋之季,而同导源于周之史官,巍然为神州学术三大宗主。”^②另外,值得指出的是,邓实虽未建立起“老子—孔子—墨子”的学术系谱,但是他在介绍老、孔、墨的时候,向首皆指出学术师承。如“孔子,老子之弟子”,“墨子,孔子之弟子”。而老子又是周守藏史,那么老、孔、墨之学,则以史学一脉相承。

其次,诸子百家出于史官。邓实指出,“诸子九流之学,溯其所自,皆出于周官之典守,其与老、孔、墨三宗之同出于史官者,未有异也”。^③ 他的出发点是“诸子出于王官”,然后用“史官”解释“王官”。他说,“不特诸子九流之学,同出于古之官守也,且同出于其官守之史官。夫向、歆云道家及术数家出于史……则九流固同出于史也。”^④表面上看,邓实继承了汉代的“诸子出王官”论。但是就实质状况而言,邓实已经偷梁换柱,用“史官”来替代“王官”,借以提高史的地位。这与刘向、歆的“诸子出于王官”论已经有相当大的差别。另外,他还从“六经皆史”出发,根据诸子为六经之支,而认定“九流固同出于史”。总之,邓实通过老、孔、墨和诸子百家出于史官,证明了“史又为周秦诸子学术一大总归”。^⑤ 如此,邓实的“诸子亦史”说完整地呈现出来。

其三,刘师培与“诸子亦史”说。除了章太炎和邓实,刘师培也是主张“诸子亦史”说的健将。这主要体现在《古学出于史官论》和《古学出于官守论》。在《古学出于史官论》中,刘师培就强调“学出于史”的论断。究其原因,主要有二:一是列国普遍设置有史官。二是史官世袭。也正是因此,史官保存了大量书籍。夏代学术保存于太史终古,商代学术保存于太史辛甲,周代学术保存于太史儋。^⑥ 在“学出于史”的认识前提下,刘师培论证了六艺出于史、九流出于史、术数、方技出于史。就九流出于史而言,刘师培说道:“有周一代学权操于史官。迨周室东迁,王纲不振,民间才智之士各本其性之所近,以自成一言。”^⑦

与章太炎和邓实有异,刘师培的“九流出于史”更多的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延伸。刘师培批评《汉书·艺文志》“道家出于史官”的认识,因为在他看来,“九流学术皆原于史,非仅道德一家”。“儒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史官”、“法、名两家亦出于史官”、“杂家、农家、小说家亦莫不出于史官”^⑧。从论证逻辑来看,寻找具体“王官”与“史”的关系,进而从“诸子出于王官”转变为“诸子出于史”。以纵横家为例,《汉书》记载“纵横家出于行人”,而刘师培认为“纵横家出于史官”。因此,重要的是证明“行人”与“史官”的学术联系。论证过程就是根据《周礼·春官·太史》的记载,指出“纵横家出于行人,然会同朝覲,以书协礼事,亦太史之职,则纵横家出于史官”。^⑨ 暂且不论纵横家是否出于行人之官,仅就行人与史官的联系言,这句话就存在曲解之处。其实,刘师培对《周礼》的记载存在误读。据《周礼》的记载,大史执掌之一即“大会同朝覲,

①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②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③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④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⑤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⑥ 刘师培《补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55页。

⑦ 刘师培《周末学术史序》,《刘师培儒学论集》,第36页。

⑧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52页。

⑨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52页。

以书协礼事”。也就是说,诸侯大会同而朝觐王,大史要依照礼书预习并记录所当行的礼事。^①首先,会同朝觐的主体是诸侯,不是行人。其次,以书协礼事的主体是大史,不是行人。因此,刘师培曲解误读《周礼》的记载,颠倒主次,过度强调“行人”与“史”的相通性,从而强调诸子出于史。

1906年,刘师培又发表了《古学出于官守论》。在文中,刘师培的论述重点在诸子与官守的关系上。他说:“盖古代之时,学贵致用,九流之说,各得其一端,故知诸子之书皆古代官学之遗说也。”^②刘师培的论述不过为“诸子出于王官”论的阐发,并无十分的新意。这与之前的“古学出于史官论”显然重点有别。不过,应当指出,对于“九流之学出于史官”的论断,刘师培并没有质疑。此时,刘师培在“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基础上试图调和其与“九流之学出于史官”的紧张。在调适的框架下,史与诸子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譬如,“儒家兼掌于史”、“阴阳家兼掌于史”、“墨家兼掌于史”、“名家兼掌于史”、“农学兼于史”、“法家兼出于史”、“纵横家兼出于史”、“兵家兼出于史”。^③如此,刘师培对于子史关系的认识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从重视“王官”和“史官”的联系转移到“王官”兼“史官”。

通过考察章太炎、邓实和刘师培的“诸子亦史”说可知,他们在具体的分析论证上存在着众多的差异。从分析路径言,主要有两种:一种是间接路径。因为六经皆史,而诸子出于六艺,所以“诸子亦史”,即史—六经—诸子。另一种是直接路径。学出于史,六经和诸子都出于史,即史—六经、诸子。就其内涵而言,“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的延伸和深化,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

首先,“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学术延伸。章学诚的“六经皆史”说是近代学人理解重构“诸子亦史”的重要前提。《汉书·艺文志》论证了诸子为“六经之支与流裔”。^④如果说班固探得了诸子的源流——六经为诸子之源,诸子为六经之流,那么章学诚通过文史校讎探讨的就是六经的源流。章学诚在《校讎通义》中明确地说:“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⑤“诸子出六经”和“六经皆史”的相合就使先秦学术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谱系:史—六经—诸子。晚清以来,“六经皆史”说得到学术界的追捧和赞扬。在某种程度上,这也为“诸子亦史”提供了知识和思想资源。既然六经为史,并且诸子为六艺之流裔,那么,顺其自然地就会得到“诸子亦史”的结论。这种论证在邓实的著作中显而易见。邓实在《国学微论》中称:“向、歆不云乎‘诸子者,六艺之支与流裔’故其序六艺也,先《易》而《书》而《诗》而《礼》《乐》《春秋》,由古以及今(古书排列,六艺皆为《诗》《书》《礼》《乐》《易》《春秋》与向、歆、班《志》异)。是其既知六艺之为史矣。知六艺之为史,而又知六艺为九流之所共,则九流固同出于史也。”^⑥因此,可以说“诸子亦史”说是“六经皆史”说的学术延伸。

其次,“诸子亦史”说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述。“诸子出于王官”论导源于《汉书·艺文志》。大致而言,儒家出于司徒,道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羲和官,法家出于理官,名家出于礼官,墨家出于清庙官,纵横家出于行人官,杂家出于议官,农家出于农稷官,小说家出于稗官;并且,各家学说相灭相生,相反相成。^⑦显然,按照《汉书·艺文志》的记载,诸子中仅有道家与史官密切联系。

① 杨天宇《周礼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版,第376页。

② 刘师培《古学出于官守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64页。

③ 刘师培《古学出于官守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67页。

④ 班固《汉书·艺文志》,第40页。

⑤ 章学诚《校讎通义通解》,第2页。

⑥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⑦ 班固《汉书·艺文志》,第25—40页。

其余诸子则与史官并无关联。对此,刘师培针锋相对地提出:“《汉书·艺文志》叙列九流,谓道家出于史官,吾谓九流学术皆原于史,非仅道德一家。”^①进而提出,儒家出于史官,阴阳家出于史官,墨家出于史官,纵横家出于史官,法、名两家出于史官,杂家、农家、小说家出于史官。刘师培突破了道家与史官的联系,在诸子与史官之间建立了普遍性的关联。那么,这种新解释和“诸子出于王官”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其实,刘师培论证“诸子出于史”不过是“诸子出于王官”论的一种新阐释。实质上,这是一种新瓶装旧酒。以阴阳家为例,刘师培称“阴阳家出于羲和,然羲和苗裔为司马氏作史于周,则阴阳家出于史官”。^②从中可以看出,刘师培并未否定“阴阳家出于羲和之官”,而是建立羲和与史官之间的联系。这种逻辑同样运用在论证其他诸子出于史官。也就是说,刘师培尝试沟通王官与史官的关联。那么,“诸子出于王官论”就构成了“诸子亦史”说的认识基础和前提。

最后,“诸子亦史”说是近代“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无论是章太炎、邓实还是刘师培,都有着强烈的“尊史”意识,并且对“诸子亦史”说的认识重心在于史上。章太炎对于历史的重要性认识,尤为凸显。一方面,历史是应对局势变化的知识资源。他认为,“涉世应变,则专恃历史之力。往日主张排满,实由历史得之”。“历史篇籍虽多,而观览实易。至如《通鉴》,《通考》,不过数百卷书。观之稍悉,处事何患于穷。”^③另一方面,历史也是爱国心的重要源泉。因为“各种科学是世界公共的,独历史各有各国的。引起爱国心,非历史不可。辛亥革命排满,就是由历史来的,不是由学理来的。人不读历史,则无爱国心”。^④刘师培也指出,“史为一代盛衰之所系,即为一代学术之总归”。邓实也呐喊说:“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⑤这种强烈的“尊史”诉求彰显得淋漓尽致。也正是如此,他们都在尽力突破“道家出于史官”的论述。邓实批评道:“夫向、歆云道家及术数家出于史,而不云余家出于史,此其自蔽也。”^⑥刘师培也批评说:“岂仅道家云乎哉!(案:辛甲以殷史为道家祖,而道家之中,又有《周训》六篇,皆道家出于史官之证。)盖班《志》所言,就诸子道术而分之,非就诸子渊源而溯之。”^⑦这种批评和突破,不过是为“诸子亦史”说奠定基础,进而把诸子与史完全地建立起一种紧密的联系。正如邓实所言,“周秦诸子,为古今学术一大总归,而史又为周秦诸子学术一大总归”。^⑧这样,“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就建立起来了。

总之,国粹派学人章太炎、邓实和刘师培都主张“诸子亦史”说。章太炎提出了“孔子古良史”和“子史互通”的认识;邓实论证了无论是老、孔、墨还是其他诸子皆出于史官;刘师培辨析了王官和史官的联系。他们的“诸子亦史”说包含着三种内涵:一,它是“六经皆史”说的延伸;二,它是“诸子出王官论”的另一种表达;三,它是“尊史”意识下的诸子学重构。

三、“诸子亦史”说的共鸣与意义

“诸子亦史”说是国粹派学人的重要学术主张。但是必须指出的是,“诸子亦史”说并非国粹派

①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52页。

②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52页。

③ 章太炎《在四川学界之演说》,《章太炎演讲集》,第193页。

④ 章太炎《历史的价值》,《章太炎演讲集》,第207页。

⑤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⑥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⑦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53页。

⑧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学人所独有。在清末民初,除了国粹派学人,主张“诸子亦史”说的学人大有人在。虽然国粹派学人坚持此说较早,并且影响较大,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之后的学者只是因袭国粹派的意见。因为“诸子亦史”说是一种时代的意见或思潮,它反映了转型时代学术发展的基本趋势。稍后的张尔田、孙德谦、江璩等皆有类似的学术主张。

1908年,张尔田的《史微》刊印。该书与一般的史学著作迥异,是讨论经学和诸子学问题。可能是效仿《文史通义》开篇的“六经皆史”,张尔田《史微》开篇即“六艺皆史也,百家学术,六艺之支与流裔也”^①。此应是全书的总纲。“六艺皆史”,本之于《文史通义》;“百家学术,六艺之支与六裔也”,本之于《汉书·艺文志》。表面来看,张尔田的学说主要承继了古代学说。但是,深入考察后,事实并非如此。张尔田已经对之进行了近代阐释,形同而实异。张尔田对“诸子亦史”说的解释如下:“故百家学术可一言以蔽之,曰原于百官之史而已。虽然,百家莫不祖史,而史之正宗则有三家,曰道、曰墨、曰杂。道家,天子之术,本出史官;墨家清庙之守,传自史角;杂家亦司史所纪。”^②与其他的学者不同,张尔田尤其重视道、墨、杂家与史学的关系,并认为三家是“史之正宗”。另外,从篇目的排序中,也可以管窥张尔田对于道、墨、杂家的重视。《史微》开篇第一篇即是《原史》;分论中前三篇为《原道》《原墨》和《原杂》。在他看来,道家和墨家是诸子百家中最大的两家。因为“二家皆原于史,皆以言天立教者也。道家出太史,太史,主知天道者也,故道家以法天为要归;墨家出祝史,祝史,主事天鬼者也,故墨家以顺天为宗旨”。^③此外,杂家“与之鼎力自成一子”,因为“杂家者,宰相论道经邦之术,亦史之支裔也”。^④与国粹派不同,张尔田根据诸子与史的亲疏关系,确立了道、墨、杂家在史学中的“正宗”地位说。他的认识主要是基于历史的固有记载,而非构建王官与史官的联系。

两年后,孙德谦《诸子通考》由江苏存古学堂刊行。在书中,孙德谦不仅阐发了“道家出于史官”,更申说了“百家者,则亦原本史官”。他指出:“儒家有《周史六弋》,而《周政》、《周法》、《周制》,非周之史书乎?阴阳家有《宋司星子韦》,子韦者,景公之史也。墨家为清庙之守,是祝史之遗也。《尹佚》二篇为墨学所祖,佚者,周之祝史,尤其明验矣。杂家之《孔甲盘盂》,甲者,黄帝之史。”^⑤孙德谦的论述中,并未依从六经皆史和诸子出于六艺的路径,也没有顺从调和“王官”和“史官”的路径,而是从《诸子略》各家所收录的书籍着手,分析诸子与史的关系,从而得出“诸子亦史”的论断。

1917年,江璩在《读子卮言》中也主张“诸子亦史”说。一方面,他说明“子史互通”,认为诸子文献中的书籍,如《周政》《周法》《河间周制》《周训》等皆为“史中之书志”。此外,诸子书籍中有大量以“春秋”命名的作品,如《李氏春秋》《虞氏春秋》《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其曰春秋,尤为史家之名”。^⑥另一方面,江璩用“近因”与“远因”来表明诸子与史的关系。他批评刘歆和班固“所言皆由其近源言之,而未溯其远源者也”。因为“凡事有因果,由果可以推因。然有近因,亦有远因,推近因而不推远因,不可也”。针对于此,江璩提出“九流皆出于史官”。究其原因,“班氏所言某家出某官,在后世虽各有专职,而在古代则皆史氏之所司。盖上古设官最简,惟有巫、史二官,各掌其学,为天下万世学术之所从出。惟始则巫、史并重,继则史盛而巫衰,终则史官且夺巫之席,故传巫之学者不足

① 张尔田《史微·原史》,上海书店2006年版,第1页。

② 张尔田《史微·百家》,第13页。

③ 张尔田《史微·原墨》,第31页。

④ 张尔田《史微·原杂》,第36页。

⑤ 孙德谦《诸子通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119页。

⑥ 江璩《读子卮言》,第10—11页。

与史敌。降及后代,史职益重,巫道益微,百官庶职皆史掌之,巫之所司不逮万一。惟政事日繁,而设官亦因日多,虽名目纷歧,实皆由史氏递变而来。然则谓诸子百家之学尽出于史官非诬语也。”^①因此,江璩的认识并非导源于《汉书·艺文志》,甚至是批驳其学说。他从巫史的历史流变中,寻找到史与诸子的跨时空联系。

以上分析了张尔田、孙德谦和江璩的“诸子亦史”说。这些关于子史关系的讨论,与国粹派的“诸子亦史”存在一定的差异。譬如,他们的论述中并未凸显章学诚与龚自珍的认识逻辑;他们的论述基于历史的固有记载,更加理性,而非过度阐释王官与史的联系。但是,他们和国粹派学人共同倾向于建构诸子与史的关系,提出“诸子亦史”说。可以说,“诸子亦史”说代表了清末民初诸子学发展中的学术共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它具有三方面的意义。

第一,从近代史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进一步推动史学走向学术中心。在近代中国的学术转型中,史学的中心化是众所周知的事件。但是,一般的讨论大都集中在从经史易位的角度考察,通过经学从中心到边缘来讨论史学从边缘到中心。经史易位的变动的确能清晰地凸显出史学地位的提升。尤其是“六经皆史”说的近代嬗变颇具代表性。从“六经皆史”到“夷六艺于古史”再到“六经皆史料”的历程,充分体现了经学地位的衰落而最后寄身于“史学”的趋势。^②可是,经史的变动只能是史学提升的一部分内容或一个维度。史学的提升也表现在经学之外的方面。1905年,刘师培的《古学出于史官论》颇能代表此种趋向。在该文中,刘师培不仅主张“六艺出于史”,而且还主张“九流出于史”和“术数、方技之学出于史”。^③此外,在章太炎看来,“史与经本相通,子与史亦相通。诸子最先为道家,老子本史官也,故《艺文志》称‘道家者流,出于史官。史官博览群籍,而熟知成败利钝,以为君人南面之术。他如法家,韩非之书称引当时史事甚多。纵横家论政治,自不能不关涉历史。名家与法家相近。惟农家之初,但知种植而已。要之九流之言,注重实行,在在与历史有关’”。^④因此,如果说“六经皆史”说及其近代回响是第一次提升了史学的地位,那么“诸子亦史”说等则是更进一步扩张了史学的范围和提升了史学的地位。

第二,从近代诸子学来看,“诸子亦史”说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近代诸子学的复兴。回顾近代诸子学的复兴,从嘉道时期到光绪的中后期,诸子学的研究者主要还是儒家士大夫,研究内容主要停留在历史文献的技术层面。可以说,此阶段的研究是乾嘉考据学在诸子学研究层面上的扩展。^⑤也就是说,之前的诸子学研究还主要处于知识层面,尚未触及社会层面。而国粹派学人的诸子学研究显然并不以知识层面为限,而是更加强调其社会层面。邓实说道:“无史则无学矣,无学则何以有国也?”^⑥正如有学者所言,“史学在近代中国被提升到国与种族(即文化)存亡的高度,实即取代了经学过去曾被赋予而在近代无力承担的社会角色”。^⑦如果史学承担了重要的社会角色,那么在“诸子亦史”说的语境下,诸子学自然也承担着极其重要的社会角色。此后,诸子学研究不仅与民主主义、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等社会思潮相结合,而且以民族复兴为己任,如“中国复兴与诸子学

① 江璩《读子卮言》,第28页。

② 刘巍《经典的没落与章学诚“六经皆史”说的提升》,《近代史研究》2008年第2期。

③ 刘师培《古学出于史官论》,《刘师培儒学论集》,第151—153页。

④ 章太炎《历史之重要》,《章太炎演讲集》,第351—352页。

⑤ 史革新《试论晚清诸子学的兴起》,《史学月刊》2006年第2期。

⑥ 邓实《国学微论》,《国粹学报》1905年第2期。

⑦ 罗志田《权势转移:近代中国的思想、社会与学术》,第338页。

说”、“墨子教义与中华民族复兴之前途”、“杨朱教义与复兴中国”等研究层出不穷。^①另外,从学术演化的角度言,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都是以“史学”的名目出现,可是两书又都以诸子学为研究对象。这两本史学著作对于近代诸子学的深化和发展的贡献绝非一般诸子学著作可比。

第三,从学术转型来看,“诸子亦史”说提供了内生转型的可能性。清末以来,把诸子学纳入中国哲学的学者大有人在。^②譬如,王国维就认为“哲学为中国固有之学”。王国维眼中的中国哲学包括诸子、六经和宋儒言说。^③这主要是受日本汉学界的影响。京都帝国大学狩野直喜就把“支那哲学”解释为包含诸子学与经学的内容。并且日本大学讲授的“支那哲学”课程也大都如此。^④这其实是代表着诸子哲学化的倾向。这种倾向主要是用西方的“哲学”系统来分析中国固有学问,包括诸子学。如此,诸子学成为哲学的一部分,诸子成为哲学家。陈柱称:“然则诸子之学,以今世学术论之,皆哲学家也。”^⑤以哲学阐释诸子学虽有一定创见,但也偏见迭出。针对于此,刘咸炘就表示反对,称“将诸子者皆谓此中国哲学之第一编也,实则‘中国哲学四字本非妥定之称。”因为西方的哲学偏重于宇宙本体论和认识论,但是“中人于人生社会之原理则讲之甚详”。就先秦诸子而言,“中国周、秦诸子则生于乱世,故其说多为社会问题”。所以,刘咸炘反对使用“哲学”,而是借用庄子的概念“道术”。^⑥章太炎也不以为然,指出“哲学”一名词,已为一般人所通用,其实不甚精当;“哲”训作“知”,“哲学”是求知的学问,未免太浅狭了。^⑦而清末民初的“诸子亦史”说恰恰提供了学术转型时期的另一种路径。因为它蕴含着诸子史学化的可能。也就是说,与外生型的哲学化不同,诸子学的转型也可以有内生型的史学化路径。

概而言之,“诸子亦史”说不仅是国粹派学人的主张,也是清末民初时期学界的一种共识。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诸子亦史”说扩展了史学的范围,提升了史学的地位;增强了诸子学的社会角色,进一步推动了诸子学的复兴;提供了诸子史学化的内生转型路径。

(作者宁腾飞,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讲师、在站博士后;邮编:475001)

(责任编辑:廉敏)

(责任校对:尹媛萍)

① 参见宋洪兵编《国学与近代诸子学的兴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② 桑兵《近代“中国哲学”发源》,《学术研究》2010年第11期。

③ 王国维《哲学辩惑》,佛雏编《王国维哲学美学论文辑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④ 严绍盪《日本中国学史稿》,学苑出版社2009年版,第198页。

⑤ 陈柱《诸子概论(外一种)》,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73页。

⑥ 刘咸炘《子疏定本》,《刘咸炘学术论集:子学编》(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页。

⑦ 章太炎《国学概论》,岳麓书社2009年版,第27页。

SUMMARY OF ARTICLES

Chen Hansheng and R. H. Tawney on Rural Economy in China // *He Wanyu*

As pioneers of studying rural economy in China, both Chen Hansheng (aka. Chen Han-seng) and Richard Henry “Harry” Tawney examined the issue through analyzing production relations. In their works, they share the view that factors such as the shortage of cultivated land and low wages contributed to the widespread poverty and self-exploitation among Chinese farmers. Tawney, on the one hand, recognized the uniqueness of Chinese Society, admitting that to solve rural problems one needs to conduct an in-depth investigation of Chinese society and carry out gradual improvement; on the other hand, he proposed social development programs based on European historical experiences. Chen Hansheng emphasized the combined impact of imperialism and feudalism on the deprivation of peasants and analyzed the change of rural social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the transition stage of social development with Marxist methods. Through doing so, he advocated a revolution to fundamentally change the relations of production in rural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y, both of them examine social problems in China and answer practical questions with academic research. They influenced each other in scholarly research thanks to their shared concerns, which provides an example for us to underst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istorical research and social reality.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i* and *Shi* in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Scholarship: Based on the Theory of *Zhu Zi Yi Shi* // *Ning Tengfei*

In the classification of scholarly knowledge in traditional China, *Zi* refers to works by pre-Qin philosophers, and *Shi* works by historians. *Zhu Zi Yi Shi* is an important theory proposed by the National Essence School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which means, “all works by philosophers are also history.” This theory is one of the manifestations of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ese academic tradition in modern times. It was, on the one hand, rooted in the discussion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Zi* and *Shi* among scholars in the Qing Dynasty such as Zhang Xuecheng and Gong Zizhen. On the other hand, it grew out of the debate between the Jinwen and Guwen Schools of Classics, as reflection upon Kang Youwei’s attempt to reframe Confucius and other ancient Chinese philosophers within the context of religion. Zhang Taiyan, Deng Shi, Liu Shippei had different ways to justify the theory, but they all agreed on *Zhu Zi Yi Shi*. In terms of the content, the theory of *Zhu Zi Yi Shi* is a radicalized version of *Liu Jing Jie Shi*, which means, “Six Classics are all history”. The latter came from the hypothesis that all ancient philosophers (*Zhu*) originated as scribes in the royal office, and it was a revisionist view on *Zhu* thanks to the growing interest in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time. Scholars after that, such as Zhang Ertian, Sun Deqian, Jiang Quan, shared this view, which formed an academic consensu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 studies on *Zhu* in the late Qing Dynasty and early Republican perio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cademic transformation, the theory of *Zhu Zi Yi Shi* not only expanded the scope of historiography and elevated the status of the history discipline, but also strengthened the social role of the studies on *Zhu*. It furthermore prompted the revival of this traditional discipline and provided an internal path of transformation as a historical turn in scholarly research.

Rethinking the Modernization of Historiography during the Song Dynasty through a Comparative Perspectiv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A Study of Historical Views and Historiographical Methodology // *Deng Rui*

A result of the modern transformation of historiography in China was that historians began to study Chinese history and historiography by comparing China to the West. They restructured Chinese historiography according to the framework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As such, this article argues that Song